

害怕写作

主编 黄子平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害怕写作 / 黄子平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4
ISBN 7-5343-7441-3

I. 害... II. 黄...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演讲—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551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害怕写作
作者	黄子平
责任编辑	杨兆鑫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鹳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本	940mm × 64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16千字
版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害怕写作（代序）

一不小心，也写了不少年头了。从1978年在北京大学鼓捣文学社、办油印杂志开始“做”文学批评算起，那就是二十八年，吓唬人可以说成“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多。往前推，20世纪70年代我在海南岛务农的时候，写过一些激情澎湃的革命抒情诗，勉强又添了五年“写龄”。再往前推就有点脸皮厚：据我母亲生前多次断言，我之所以吃上“文学饭”，跟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大为嘉奖必然相关。母亲并没有为我珍藏这些“获奖作品”，却硬说我从小就有写作才能，完全缺乏证据。幸亏那些“作品”没有被保留，要不就像重温穿开裆裤的婴孩老照片，羞煞。

我想说的只是：不管上推到哪一年吧，总之我“写龄”蛮长，

写出来的文字却很少。

我在北大的友人钱君(钱理群)和平原君(陈平原),每年外出开学术会议经过香港,总会送我两到三本新书,有学术专著,有随笔集、论文集、演讲集、序跋集,乃至自选集。而且越出越漂亮:精装的硬皮烫金,上、中、下三卷插在书架里甚是壮观;平装的插有大量照片,图文并茂。平原君最近送给我的一本是毛边未裁本,古雅得很。问我近来有没有出新书,我便摇头微笑,说还是几年前那两本。无书回赠,何以报之?唯有请他们吃香港馆子。在香港,出书不易,吃馆子倒还方便。

如今在学院里教书,“不出版就完蛋”(“不发表就被炒”)。每年暑期将尽的时候,就有一份很重要的表格要填。我这人一不晕车二不晕船三不晕飞机,就是晕表格。没法不晕,那些表格光统计这一年的“出版”倒也罢了,还要分门别类,考察你写的东西是否发表于有“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报(内地叫做“核心期刊”),是用中文写的还是用英文写的,是论文、专著、教材还是创作,如果是联名发表的请标明排名的先后次序……分门别类是让行政部门计分方便,可苦了像我这样的“晕表症患者”。平时写的东西写完就忘,经常是收到稿费才想起来写过这样一篇东西。填表的时候每每手忙脚乱到处翻箱倒柜,统计完了一看,今年确实又没写什么。写的还都是些计不了什么分的,无关乎香港经济复苏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东西——积分可怜,饭碗危矣。

于是发愤要多写,不过须先检讨写得少的原因。

写作源于阅读,阅读先于写作。在写第一篇文章之前,你已经读了很多。在成为作者之前,你早已是一位读者。所有人的“读龄”都长于“写龄”。正是阅读鼓舞了你的写作勇气。少年时气盛心浮,走进阅览室翻翻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一看,这种东西也能发表,还有稿费,那我也能写。写了,投寄了,发表了,手写体变成了铅字,大为振奋。周围的朋友开始称你为“诗人”或“作家”,在你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还没有跟“写手”或“稿匠”混为一谈。你听出来称呼里半是嘲讽半是嫉妒,心里头半是得意半是谦卑。稿费只好全数拿出来请吃馆子。如今年纪大了,还没走进图书馆就想起庄子那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走进去一看,一排排满架的书列阵而来,千军万马衔枚无声、气势逼人。你会想,世界上所有深刻的话、聪明的话、漂亮的话、又深刻又聪明又漂亮的话,都早已被人说过了、说完了、说烂了。你又何必在千万本平庸的书中再添一本,如古人说的“祸延梨枣”,今人说的浪费纸张、又多砍了几棵树影响生态环境。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就这样因年岁而变迁,从前怦怦咚咚催你“一鼓作气”奋力向前的声音,稍一侧耳,听来却好似“鸣金收兵”。

这种暮气横秋的说法,表面看来像是历尽沧桑很深沉,却多半是为自己的疲懒强作托辞。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在作祟,让你一直害怕写作?稿子为什么总是到了“死线”(deadline)

截稿日才匆匆赶出,以前用快递、后来用传真机、如今用电子邮件附件送出去?抽屉里、硬盘中为什么总是积满了写了一半或只写了个开头的未完稿?更别提那些大纲,那些片段,那些随风而逝的所谓腹稿了……

不久前去世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里写道:“我每一出门,都随身太多负荷,就是只去市区,包包里塞满的物项之多之大,也和实际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我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我可能不会再回原处的恐惧。写下那段话以来,我发现,尽管有此恐惧,我还是制造离去的场合,变成自愿给这恐惧提供滋生的机会。这两者似乎成为我生命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且从我生病以来已急遽加强。”离去、抵达、流亡、怀旧、思乡、归属及旅行本身之中出现的地理是赛义德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害怕,害怕空间的位移,同时又视此为成就自我生命的绝对必要条件——“流亡与错置未尝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视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正是这段话令我怦然心动。我想到,人必须面对他自己的害怕,甚至自愿滋养这种害怕,并从中获取生存的希望。

那年的暑假我只有八岁,记忆中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带着六岁的弟弟回我引以为豪的小学去玩。他很快也要上这家小学了,我要带他见识见识教室、操场、礼堂,最好能碰上教语文

课的陈老师,她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帮我改过作文呢。可一进学校,我就发现气氛很不寻常,满墙的大字报,黑字红叉墨汁淋漓。小学二年级学生识字不多,陈老师名字被倒着写打上叉也还是认得的。何况还有一幅“百丑图”,全校一多半老师被变了形画在了上面。晚饭时分我问父亲什么是“右派分子”。我完全忘了他是怎样向一个八岁小孩详细解释这样复杂的名词术语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正被打成这种“分子”。

这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乡下,那所小学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成绩就一直优异,远超过语文、历史、地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句流行全国的俗语从母亲口中道出,是那样语重心长,传达给我的正是那无以名状的“怕”。

在海南岛劳作八年,“数理化”没帮我多少忙。在那个奇异的年代,一方面文化被“革”了命,另一方面,“巩固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20世纪70年代中,很多有门路的知青都倒流回城,于是“笔杆子”告缺。农场领导对我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可以使用,不可重用”。于是,我开始从生产队被借调到上头写材料,写报道、总结报告、工地宣传稿,乃至文工团演出用的快板书、相声、歌曲、小歌剧的文字稿。如此写作,战战兢兢,绝对是苦事。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领导层层审阅通过。有时副书记通过了,正书记又说某段某行的“提法”有问题。场部老“笔杆子”教给我一个窍门,直接交给正书记审阅,他要通过了

没人敢说还要改改。写作与权力的关系,不必等到多年后阅读福柯,在我被借用为‘写作工具’的岁月里,早已深晓其中滋味。

给我当头棒喝的是文工团里一位跳舞的知青。他看了我写的那些“文艺节目”,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么?你真的愿意扎根五指山下种一辈子橡胶么?你真的愿意召唤别人,比如你的弟弟妹妹,也来扎根么?”我只好苦笑:“八年了,也算种了半辈子吧。我弟弟倒是一直跟我一起在这里还扎着根哩。再说,不这样写,该怎么写?”潜台词是,你跳跳“常青指路”什么的,舞姿刚健有力就行,不担风险。书面语言不比肢体语言,我这可是如履薄冰啊。可是我心里明白,完全存在着“不这样写”的许多种写作。

1978年某日,几位同学下了课走在去北大学生食堂的路上,见食堂的外墙旁边围满了人。油印的《今天》创刊号糊满了一面墙壁,在上面我读到了北岛的《回答》,还有芒克的“天空/血淋淋的盾牌/黑色的太阳/升起来”。我想,这就是我渴望多年的另一种写作啊!那几年我参加了《早晨》、《未名湖》、《这一代》等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亲历了被我称为“劫后文学”的写作洪流从地下奔涌而出的年代。“害怕”并没有离我而去。那年八一湖畔的“今天诗歌朗诵会”,让你体会到了诗歌的力量、沉默的力量和发言的力量,体会到了直面自己的害怕时产生的兴奋与激动。

在我的学术写作中,最重要的当属与钱君、平原君合作的

《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框架得到很多朋友的认同,究其实,也不过是想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写作重新发声罢了。但是那个年代给了我一个错觉,令我以为能够预设一种“纯文学”或“零度的写作”。深刻的反思使我看到写作与权力的纠缠远为复杂(当然,阅读福柯也是重要的思想历程)。就以每年经受的晕表格折磨为例,我体会到学术写作多么深地嵌入了一整套权力体制之中。可怕的是,你自己就是这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在教年轻人阅读与写作,用考试和分数来规范他们,限制他们,训练他们,把他们引向前途未必光明、道路绝对曲折的学术方向。作为一个写文学评论的人,你对他人的写作说三道四,调动所有的理论资源,义正词严,去驯服文学原野上狂奔四散的作品。看清楚你的位置,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力、写作的资格,就凭那几张体制认可的学位证书么——我感到害怕。

传说仓颉造字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古人对写作将会带来的灾祥有如此深刻的恐惧,我是在“写龄”渐长的今天才慢慢地体会到的。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声音中心主义”,也可以说是古人对“文字文化”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深刻敬畏。然而,不要害怕你的害怕。害怕,让你体会写作时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空虚与充实,同时带来清醒和谦逊。写作,就是克服害怕。我害怕写作,同时写了《害怕写作》。

目 录

第一辑 文学与教育

- 3 从北大到 McBeida
- 10 以“体裁”为重点的文学教学
- 22 学诗以言志

第二辑 衣食文学

- 35 更衣对照亦惘然
- 57 故乡的食物
- 75 宵夜、消夜与夜宵

第三辑 边缘阅读

- 81 批评的位置与方法

2 害怕写作

- 92 白话经典·八股眼光·才子文心
- 106 书评五则
- 125 读书小札
- 138 漫说“漫说……”

第四辑 香江话语

- 145 “香港文学”在内地
- 158 如何在 21 世纪的香港用汉语写作
- 176 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
- 184 在“新”世纪如何继续讲“故事”
- 189 诗歌、印刷和网络
- 200 在词语的风暴中借诗还魂
- 217 茶餐厅里的“后殖民主体”
- 227 关于两篇获奖小说的对话

附 录

- 247 “现在做批评没有以前好玩”
- 258 喜欢阅读

- 267 后 记

第一辑 文学与教育

从北大到 McBeida

所谓天下大势,乃“天下”成了大势也。这“天下”,即彩色电影《英雄》里梁朝伟用硬笔书法写下的那俩字儿。用从前社论文体的修辞,叫做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不管有名无名,趁早自个儿抹了脖子才算是识得时务的豪杰。当然了,如今这“天下”的现代叫法是“全球化”。去年初夏在南京,与哈佛教授李欧梵伉俪同游中山陵。远远看到“天下为公”那块匾,李教授就说:“哈哈,全球化,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来了!”我仔细端详那匾,说:“这‘公’,和‘公司’的‘公’是一个写??”正是!正是!‘公司’的‘公’英文译法读做 COM,音义同译,可称一绝。”不妨抢注一个网址叫 www.tianxia.com,这 COM 原就是 Company 的缩写嘛。”一路谈笑不提。

话说这“全球化”的进展,却不是我等弄文学的人便可等闲视之的。二十年前,早有弄社会学的人,找到了一个来说明这大势之所趋的标记性术语:“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如何,你只要数数那里有多少家以M为字头的快餐店便可。香港地区的孩子亲切地称这店为“麦记”。“麦记”的广告总是做得非常有创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爱斯基摩人在雪屋中围火取暖等着开晚饭,一身穿着白熊皮袄头戴白熊皮帽的男子推门进来,满面笑容地说:“我回来啦!”手中高举的正是印有醒目“麦记”标志的褐色纸袋。镜头一转,一群非洲土著围着篝火击鼓舞踊等着开晚饭,一裸着油黑上身的男子从树丛中隐而显,右手握矛,左手高举褐色纸袋,满面笑容地说:“我回来啦!”——要说明全球化如何无远弗届,这广告应为首选。

“麦当劳化”指快餐店的准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及世界其他更多领域的过程。其核心为“形式理性”,由韦伯之“工具理性”变本加厉,所触及的不光是消费品味,更影响到认知、思考和价值理念的形成与改造。社会学家列举了“麦当劳化”的四个最重要的要素: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即技术取胜性。有了这四个原则,“麦记”遂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终于,连“最后堡垒”的高等教育,也陷入“麦记”准则之手,社会学家称为“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McEducation)。

这一大势由西东渐，麦风浩荡。近年国内身处高校中人，无不感同身受，领略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滋味。日前听说有台湾地区一百四十几位教授（包括大学校长），联署“重建教育万言书”（口号是：“饶了孩子吧！”、“饶了家长吧！”、“饶了教师吧！”）因未看到原文，不便引用。单说香港地区这几年怨声载道的高等教育改革。管拨钱的机构叫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去年重金请了一位英国勋爵来考察各高校的运作，发表了一份检讨报告书。这个报告书的重点，即在于如何使高校资源的调配“合理化”。话说香港地区各大学的拨款，乃以一年级新生的人头计算。这当然有不合理的地方，有许多招不到足额新生的科系，不得不降低招生标准，以维持教员生计。“合理化”的建议是改为按学分拨款，叫做“学分积累及转移制度”，学生可以在港大听课，也可以在科大听课，他在哪里拿了学分，拨款跟着学生走。这听着挺合理吧？那么，什么样的课能够吸引到全港大学中最多的学生来听，从而卖出最多的学分，争得最多的拨款？还用说？麦当劳式的课程是也。

与此配套的措施当然也很多，如期刊论文评分制、教员薪酬与学科挂钩（有教员说：“难道教地理的跟教物理的教授拿同样的薪水是合理的么？”地理与物理居然不同一理，谁有钱谁有理。）凡此等等，配合了连年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之举，各院校真个是“人仰马翻”。最妙的是每年请大公司的老板为大学毕业生打分，看看产品质量是否符合雇主的期望。甚至有一条，说

的是大学的拨款将按照毕业生在各公司的薪酬水平来厘定。这些听来荒谬的建议居然能堂皇出台,足以证明‘麦记’理念已深入制度经济学家的骨髓,浑然不觉也。最是困扰我等在中文系以方块字课徒的人者,莫过于用中文写的论文不算分或少算分了。果然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某一年同时有六位教员不获续约,其中一大猫儿腻即中文著作不计入学术成果,逼得他们用‘种族歧视’的名目来上诉。香港地区高等教育以市场与功利为导向挂帅,被切割为一系列固定的,可测量与可评估的程序,其产品应该是可预测的,标准化的和量化的。这些评估,“扰民”的效果大于“促进教学”。去年,学校花重金请了三位讲英语的教育专家,来评估我所在中文系的研究生课程。全系教员连同研究生提早结束放暑假,急慌慌准备汇报材料,连场排练有如嫌犯串口供。最后学校怕我等操番语词不达意,请了最好的同声翻译来助阵。评估的结果是“very good”,其实他不来会“better”。

我本以为这只是香港后殖民时代的怪现状。不料去年有一学期的学术假,得以到内地的几所大学访问,与同行们聊天,方才晓得内地早与国际接轨,教育积疾未除,洋商场新症又添。蔡元培当年从后门赶出去的两大玩意儿(“做官”、“发财”),如今大摇大摆,从前门回来了,而且冠冕堂皇,要超英!赶美!创一流!这些年都忙什么呢?争博士点,建基地,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二桃杀三士,九品中正制,核心刊物论文数量排行

榜,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用李零的话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皆忙死。可是地里不长庄稼,光长数字。

“麦记”的人事制度中有一条,能用机器干的活,绝不用人干(非人性化)。能用临时工干的活,绝不雇用长期工。我的小亲戚每年都在麦记打暑期工,有全球一致的员工手册,略加训练即可上岗,好处是汉堡包管饱,坏处是暑期过后得加紧跑步减肥。时薪若干,通常紧贴“最低工资水平”。香港各理工科系每多内地来的“博士后”,价廉物美,真正发挥了“麦记”用人原则的优越性。北大“癸未变法”,紧一脚慢一脚赶上了“全球临时工时代”的来临。在一个历来主张让人“安心做高深学问”的地方,要不是有天下大势撑腰,谁敢公开说要让第一线教学人员“随时处于被解雇的危险威胁之中”,还博得阵阵掌声?

那些没法量化(人文关怀?),不可预测(三年内出国际水平的成果?),又消耗资源的学科、人员及其活动,无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整个店炸掉”),或者“转型”。如有绝顶聪明的人所建议的,把北大的文史哲转为“国际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专向老外介绍吾国国粹,而且可以办得很大,安置大批下岗讲师、副教授,又为一流大学挣得大量外汇,可用来为其他系从“世界市场”买一流教授。我想象若干年后,未名湖畔书声朗朗,国人皆操番话,说汉语的反而是那些热爱中国功夫和养生术的外国留学生了。这绝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改革方案初稿里有一条,说是“除少数特殊学科”,新聘教授至少要有用一门外语授课的能